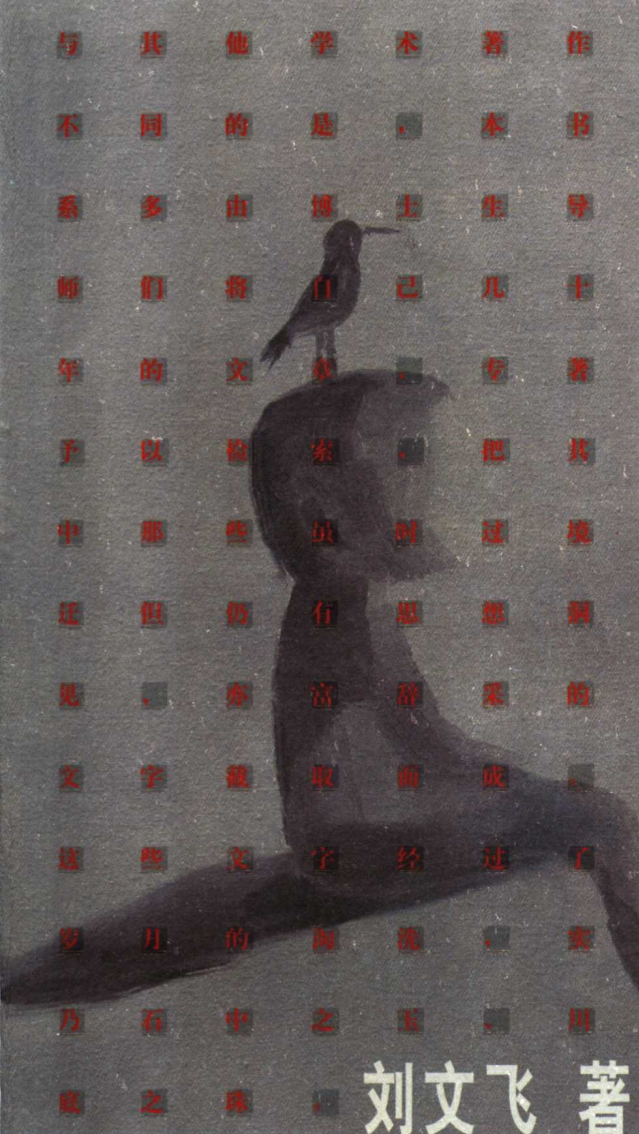


思

想

俄

国



刘文飞 著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四辑

山东友谊出版社

思 想 俄 国



第四辑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俄国/刘文飞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 12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
ISBN 7-80737-012-2

I. 思... II. 刘... III. 文学研究—俄罗斯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835 号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第四辑)

思想俄国

刘文飞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756 82098755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mm × 228mm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天赋才能，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焚膏油以继晷，独兀兀而穷年”，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其造诣渐臻纯青，在学坛颇有影响，甚至名及海外。但是，他们的成就却少为普通读者所知晓。所以，让高雅的学术走出殿堂，甚为必要。然而，博士生导师的专著和大块文章，多以思辩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旁征博引而著显，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自由的阅读渐成时尚，让学者的思想、智慧与读者的需求近距离链接，成为我们策划本书系的初衷。与其他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系多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所截取的文字有章节、有片段、有三五语句，重新编排，再成系列。其长者如随笔，短者如小札，如散文诗、箴言录。……读者随意翻读，必有启示心智、陶冶性情之益。

这是本书系的第四辑。

诗与思(代序)

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诗”与“思”，也许原本就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前者是一种本能的、审美的方式，后者是一种经验的、判断的方式；前者诉诸情感，后者诉诸理性。而海德格尔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则仿佛在设计此两者的融合。一个大脑基本健全的人，是不可能不思考的，一个意识有了初步发展的人，也不可能不审美，而一个将“诗”与“思”统一于一体的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意识活动最为活跃、精神生活最为丰富、情感世界最为多彩的人。

然而，在外部世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人类的“诗”与“思”都似乎越来越少了。在这样一个日益技术化、甚至数字化的时代，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面对生活的诗意呢？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时代还需要诗歌吗？在有用性、精确性、合理性，还有所谓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等等方面，诗歌无一不显示出了她的尴尬。但是，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仍永远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她与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她诉诸的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情感。

与此同时，如果不将科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等包括在内，人类的非功利思考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对存在及其意义的穷究，正在成为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专业”，而整个人类却似乎有了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挣钱）要做，换句话说，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代，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况的关注反而有所降低。将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个平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在这一世纪中所取得的进步据说数百倍于先前所有世纪之进步的总和，而后者的进展却很难说是革命性的，至少不能说有成倍的增长。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需

要维持某种平衡的,对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探索与对人类自身基因密码的破译基本同步,但在精神存在研究与物质存在研究这两个方面暂时还是不协调的。因此,人类无疑需要更多地思考。

无论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还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持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诗”与“思”的平衡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思”的庄重,也需要“诗”的空灵,我们需要“思”的结果,也需要“诗”的过程,两者都是我们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立面。这大小两种平衡的谋得和维持,便是我们最正常的精神存在状态。

要维持这种状态,阅读也许是一种最佳方式,或曰一个捷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诗意,在阅读中加深思考。当然,人类的文明史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诗”的读物和“思”的文本,也许,我们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

目 录

诗与思(代序)	(1)
---------------	-------

第一辑:文化

两个被强加的称谓	(3)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间的复杂关系	(4)
两派的对峙对俄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7)
16 世纪俄国的一场君臣之争	(10)
伊、库通信的文学史意义	(12)
伊、库通信的文化史意义	(14)
阿瓦库姆和俄国宗教分裂运动	(17)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生活纪》	(19)
哲学与宗教的结合	(21)
爱祖国与爱真理	(22)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的起源	(24)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26)
“精神上的回归”	(28)
赫尔岑关于两派之争的思考	(30)
理解白银时代的两种倾向	(33)
白银时代的意义	(36)
“哲学之舟”的去与归	(38)
论巴赫金的诞生	(39)
一位独特的西方派	(42)
俄国文化的“合唱原则”	(44)

“斯堪的纳斯拉夫”	(46)
大河与文化	(48)
俄罗斯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50)
文字是文化的衣裳	(52)
莫斯科和彼得堡	(54)
政治的艺术化	(55)
“后苏维埃”现象	(56)

第二辑:文学

前苏联文学的特征	(61)
前苏联文学的成就	(64)
“两部文学史”和“三个浪潮”	(67)
凯旋之后的失落	(70)
诺贝尔文学奖与俄语文学	(73)
俄国短篇小说的特征	(75)
俄语散文的风格	(77)
俄国的诗歌	(79)
俄语诗歌的性质和风格	(81)
《20 世纪俄语诗史》的写作原则	(83)
象征派	(85)
阿克梅派	(87)
阿克梅派的理论主张	(89)
未来主义	(92)
农民诗歌	(95)
共青诗群	(97)
“高声派”诗歌	(99)
“细语派”诗歌	(101)

肖洛霍夫之后的俄语文学	(104)
俄语布克奖	(107)

第三辑:作家

普希金创作的主题和特色	(113)
普希金抒情诗歌的特色	(116)
普希金的爱情诗和友情诗	(119)
普希金小说创作的意义	(120)
普希金的剧作	(122)
普希金对于俄国文学的意义	(125)
普希金的纪念碑	(128)
“太阳”与“月亮”	(130)
《童僧》与《恶魔》	(133)
“假面”与“英雄”	(136)
《群魔》的写作指向	(139)
《群魔》解读	(142)
另一部《父与子》	(145)
《普希金演说》	(14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	(149)
《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150)
《复活》	(152)
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	(154)
托尔斯泰的出走	(156)
另一种《圣经》	(157)
一句误译的台词	(159)
两座《樱桃园》	(160)
青春的高尔基	(162)

《忏悔》和造神论	(164)
毗邻的文豪故居	(166)
勃洛克	(167)
布宁:诗与小说	(169)
《萨宁》和“萨宁性格”	(170)
古米廖夫的诗歌遗产	(173)
赫列勃尼科夫	(175)
《最后一次相见的歌》	(177)
《安魂曲》	(179)
《普希金的〈石客〉》	(182)
诗歌漂流瓶	(184)
文明的孩子	(186)
《时代的喧嚣》	(189)
词与文化	(192)
文化的旗帜	(195)
《天放晴时》	(198)
茨维塔耶娃的孤独	(200)
诗人与流亡	(203)
独白的诗	(206)
有感于马雅可夫斯基	(208)
马雅可夫斯基和未来主义	(210)
“科克捷别里的宅子”	(214)
叶赛宁的诗风	(216)
别雷的代表性	(219)
普里什文的意义	(221)
“亲人般的关注”	(224)
“作为行为方式的艺术”	(226)
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	(228)

新斯拉夫主义	(230)
索尔仁尼琴遭遇挑战	(232)
悲伤与理智	(235)
布罗茨基的矛盾	(238)
《狄多和埃涅阿斯》	(242)
布罗茨基的意义	(245)
“布罗茨基诗群”的启示	(248)
维索茨基之谜	(251)
维索茨基之启示	(253)
拉斯普京的新主人公	(255)
迟钝木讷的钟摆	(256)
后记	(258)

第一辑·文化

两个被强加的称谓

作为文化史概念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出现较晚,大约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但这两个词汇的出现要稍早一些。俄语中的“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是个组合词,字面意思就是“热爱斯拉夫人的人”。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开始前后,西方派把这个词从俄国诗人巴丘什科夫的一首诗中挑了出来,扣在对方的头上,用来讽刺对方对那些斯拉夫古风旧俗的热衷。斯拉夫派也针锋相对,称对方为“西方派”(западник),这同样是一个组合词。值得注意的是,论证的双方都对强加于自己的名称不感兴趣,很少以之自称。至少是在这两个概念流行的最初,两派都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两个词中所包含的嘲讽意味。

在汉语中,Славянофилы 和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一般都译为“斯拉夫派”(或“斯拉夫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这没有什么问题。而 Западники 和 Запаничество 则存在多种译法,通常译为“西欧派”,又译“西化派”,还有译“西方派”者。笔者以为,还是第三种译法更好一些,译“西化派”似有发挥稍过之嫌,译“西欧派”则似乎缩小了该概念的原意,因为原文中只有“西方”(Запад)而无“西欧”(Западная Европа)。在当时争论双方的心目中,所谓的“西方”自然主要是指英、法、德等西欧大国,但在宗教、文化层面上,相对于俄国的西方,往往就是整个拉丁化了的西方世界,甚至包括教会合并之后的希腊和一些接受了天主教的中东欧国家。到了当代,俄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其内涵和外延无疑都更加宽泛了,至少包括美、加、澳等北美和大洋洲国家在内。因此,“西方派”这个更接近原文、更模糊一些的译法,使用起来也许会更贴切、更方便一些。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间的复杂关系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其复杂性至少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同属自由派的双方相互之间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争论。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知识界和思想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派别，即靠拢官方的保守派、主张变革现实的自由派和疏远现实的“纯艺术派”。处在官方和在野两大势力之间的，就是自由派，而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实际上同属于这一派别，差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温和的自由派”，一个可以称之为“激进的自由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当然是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但是在面对俄国的农奴制现实时，两派都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作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两派人士都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抗议，对下层人民的疾苦表示出了深刻的同情。作为俄国知识阶层中的中间力量，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既反对不问现实的“唯美”，也坚决拒绝为沙皇及其统治大唱赞歌的官方意识形态吹鼓手角色。但是，同属自由派阵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为何相互之间却爆发了最为激烈的争论呢？原因之一，恐怕是他们双方有着最为接近的前沿阵地，如果把当时俄国社会中官方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和在野的、消极的意识形态看成是两个圆圈，那么，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就似乎共同处于这两个圆圈的相交部位，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社会态度在这里相遇，并发生激烈的碰撞。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正因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拥有的某些共同的立场和话语，才恰好使得他们获得了对话的平台，他们棋逢对手，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值得与之展开对峙和争论的对象；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彼此都是对方展开思想、发出

声音的媒介。试想,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他们不可能去与官方意识形态展开旗帜鲜明的抗争,而他们那些关于现实的诸多热切思考,也很难在唯美派那里激起什么热烈的反响。

其次,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相互之间的阵营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清晰。我们知道,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不是组织严密的团体,而是结构松散的思想共同体,他们没有签署过什么纲领,没有颁发过什么会员证,这两个所谓的派别,实际就是两个围绕在某一理念周围的一群思想者。这就决定了,这两个派别的构成必然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总是永远一致的,两派之间的界限因而就常常是游移不定的,模糊不清的。需要说明的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开始了俄国历史上意识形态管制最为严格的一个时期,而1848年的欧洲革命,更使俄国的当权者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道的革命派别及其声音是不可能公开存在的,它们被迫改头换面,加入了自由主义的阵营。另一方面,在尼古拉一世当政后期的“昏暗的七年”(1848—1855)中,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主动地脱离了官方阵营,转而接近了自由派。也就是说,除了死心塌地的御用文人和看破红尘的艺术家,各方高手可能都聚集到了斯拉夫派或西方派的旗帜之下,其构成上的复杂,直接导致了两派之间、甚至两派自身之中观点和立场的斑斓。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游离于两派之间的人物,看到了许多改换门庭的人物,看到了更多修正了观点的人物。

第三,两派构成上的复杂,还导致了两派各自内在的不一致现象,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不是铁板一块,其中都也存在着许多争论,有的争论就其激烈程度而言,似乎并不亚于两派之间的争论。有这样两件小事,能帮助说明斯拉夫派内部的一些纷争:康·阿克萨科夫为了标榜自己的斯拉夫主义立场,不仅留起了胡须,而且还换上了一身俄国古代的民族服装,可是当他以这身装扮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时,“老百姓都以为他是波斯人”,他的这种扮相,一直没有得到大多数斯拉夫派人士的肯定和模仿;诗人雅济科夫是斯拉夫派首领霍米亚科夫的亲戚,他从欧洲回国之后不久就加入了斯拉夫派阵营,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写了一首

言辞十分激烈的诗《致不是我们的人》，没想到，此诗却引起了本方人士如康·阿克萨科夫等人的不满。而在西方派阵营中，有一些分歧则是原则性的，如别林斯基与被视为“自然派”首领的果戈理的书信论战、赫尔岑与西方派的公开决裂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在 60 年代初的逐渐平息，固然与他们共同的首要关注对象和争论焦点——俄国农奴制的取缔有关，但无疑也是两派内部长期积累起的大小矛盾不断作用的结果。如果“内讧”过多，自然就难以集中精力对付敌人了；如果能在敌对的一方发现许多更为亲近的人或观点，此一阵营无疑就会土崩瓦解。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能给我们以这样两点启示：第一，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实际上是有同有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异而非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在争论的当时，当事人的双方关于“同”的表述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异”的强调才能凸现自己之观点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争论已成为历史的后世，较之于“同”，“异”更能引起注意，也更能激起谈论、研究的兴致。但是，在关注“异”的同时也应该多少关注关注“同”，否则就有可能误读历史，在这里，就是在感觉和印象中放大两派之间的鸿沟。第二，当我们在观察作为一个整体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个总的思想倾向，一个相对一致的理论框架，而当我们面对某一个作家或理论家的时候，却往往难以把他完整地纳入某一流派的理论框架之中。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大作家，其创作往往是超越某一流派的，其中也往往呈现出亦此亦彼的思想取向，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和模糊性，这就提醒我们，将某一家纳入某一流派有可能是危险的，而仅仅从某一流派的立场出发来解读一位作家，就有可能更加危险。流派可能是相对一致的，而流派中每一个个体却常常是无限丰富的。